



“夜郎见证”丛书

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 编

YELANGYANJIUXUANCUI

夜郎研究 选粹

—
学人见证

熊宗仁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夜郎见证”丛书

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 编

夜郎研究选粹

——学人见证

熊宗仁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郎研究选粹:学人见证/熊宗仁主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1

(夜郎见证丛书)

ISBN 978-7-221-08746-1

I. ①夜… II. ①熊… III. ①夜郎-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7826号

夜郎研究选粹

——学人见证

熊宗仁 编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责任编辑:程亦赤 龙建人

封面设计:熊 锋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恒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1092mm

开 本:16

印 张:22.5

字 数:360千字

版 别:2010年10月第1版

版 次: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21-08746-1 定价:45.00元

前言

熊宗仁

夜郎国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它曾经有过的辉煌早已消失,但两千多年来却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解答的历史之谜。进入新世纪,当人们认识到历史是地域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文化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是地区间差别优势和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时,在以贵州为主包括滇东北、川南、重庆部分地方、湘西和桂西部分地区,在发掘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时,都先后不同程度地把夜郎文化作为开发利用的资源。于是,形成了一个与古代夜郎国和夜郎郡县及其影响所及的地域相匹配的夜郎文化圈,产生了日渐加温的“夜郎热”。这本论文集也就应运而生。

一

夜郎文化因夜郎国而产生。在研究和开发利用夜郎文化时,研究夜郎国的历史便是其前提和基础。而夜郎文化的研究及其开发利用,是夜郎国历史研究跨时空的拓展,是学术性研究向现实经济社会的贴近和延伸。

夜郎国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可以上溯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它追叙了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的夜郎国的历史梗概,并记述了与夜郎同一时期相关联的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即“西南夷”的生产生活状况。此后,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记》、常璩的《华阳国志》、范晔的《后汉书》等史籍均不乏记载。如此绵延继续,夜郎的史事可谓史不绝书,虽大同小异,互有抵

晤,却隐然透出了那失落的文明品牌诱人的辉煌。明清至民国,考证夜郎江河、地望、民族及陈迹轶事的学者踵接不断。其代表作和代表作者有:莫与俦的《汉且兰故地考》、《牂牁考》;郑珍的《牂牁十六县问答》、《牂牁考》;洪亮吉的《牂牁江考》;田雯的《牂牁江考》;靖道谟的《夜郎考》;王允浩的《夜郎本末》等。民国年间,在清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胡羽高著有《牂牁丛考》,任可澄主编的《贵州通志》对夜郎史事也多有记载。《贵州文献季刊》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但其研究方法仍未摆脱文献考订与史实辨误的传统,故其价值亦未超越前人。

真正把夜郎问题作为贵州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多角度的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贵州一些学者发表文章,对夜郎国的概况、疆域、社会性质、汉代夜郎的兴亡以及夜郎灭国后历代设置夜郎郡、县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把夜郎国的历史概貌及夜郎文脉的源流演变作了粗略的勾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以贵州学者为主联合川、滇、湘、桂学者,对夜郎的历史进行了学术性、综合性和较为系统的研究,掀起了史学界研究夜郎的第一个高潮。之后,一直到20世纪末所发表的有关夜郎研究的成果从未间断,特别是1999年10月在贵阳召开的“'99夜郎学术研讨会”及其成果《夜郎研究》^①的出版,经过海内外媒体的宣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古夜郎之谜,寻找失落文明的“夜郎热”。这次学术研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促成了夜郎国历史的学术性研究向开发利用夜郎文化,发展地方旅游业,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化。

综观此前对夜郎国历史的研究,可以确定,夜郎是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或者说仅是一个部落联盟。其存在的时间上限,有人认为可上溯自春秋时齐桓公会盟葵丘前后的牂牁古国;即使上限难以确定,下限则普遍认为至汉成帝河平年间,约为公元前27年前后。其存在的时间,约200多年。其空间范围,有大夜郎与小夜郎之别。大者范围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说它“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也即是说今贵州绝大部分,北至川南,西北迄滇东北,南抵今广西田林、南丹,东至湘西皆属夜郎国的范围。这个“大夜郎国”事实上不存在。但夜郎国的领地或其影响所及包括今贵州省境西的大部和滇东北一部却是无疑的。它的统治中

^① 《夜郎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

心区或都邑,虽说有过游移迁徙,但据史称,汉武帝平南越时,欲调夜郎精兵10万,直下番禺。而史书中确切指示:“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大多数学者认为牂牁江即今之南北盘江,其下游红水河连接珠江。因此,夜郎的中心区极有可能在南北盘江流域。根据考古发掘的木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佐证《史记》上记载夜郎民族“耕田有邑聚”,说明它已步入锄耕农业。虽然它比同时期的巴蜀、荆楚、岭南地区落后,但却比那些尚处于游牧或半牧半农的民族进步。夜郎与周边地区有贸易交换。无论认为它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还是已进入奴隶社会,甚或其晚期已步入封建社会的门坎,夜郎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确曾创造了堪令汉王朝另眼看待的文明。夜郎到底是哪个民族的先民创造的?历来争议最大,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最早的夜郎人来自周代的徐淮夷中的谢人。无论认为夜郎的土著民族是今佬族,而其主体民族是彝族或布依族、侗族或苗族或其他民族先民的人,都认为夜郎的民族中有土著和外来的两大类,他们经过长期的冲突融合演进,与今贵州境内的许多民族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对于神秘的古夜郎国的真实状况,由于汉文献、少数民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都不能提供使人深信不疑的证据。科学的态度应是不匆忙作结论,学者间的分歧也可求同存异,待考古发掘有了新的突破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正是上述历史的诸多不确定性,造成了广泛的神秘感,才刺激了人们竞相探寻历史奥秘的兴趣,并导引和延伸出夜郎文化这一新的足以供学术和现实利用的新领域。

夜郎及其文化所蕴含的全部价值,既体现在它存在的两千多年前的客观史事,也体现在科学地认识和利用它持久不衰的魅力和人们对它弥久愈新的关注。夜郎所创造的文化,是古代西南民族文化的奇葩。它在夜郎灭国后仍对当时和以后居住在其故地上的人们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谓夜郎文化,并非特指两千多年前存在的夜郎国的文明,而泛指夜郎时期及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他们与周边文化相互碰撞融合而成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民族文化。它是当代贵州及其周边历史上先后与夜郎国和夜郎郡县设置有关系的地方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基因、源流。它渗透于今日贵州乃至周边一些地方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和世所公认的文化符号,它是历史,也是现实,更影响着未来。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与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南越相齐名并相互影响的夜郎文化。在历史与当今的现实中,夜郎文化圈的存在也就毋庸置疑。

在夜郎文化圈这一喀斯特王国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中,相对保存完好的夜郎文化的绰约风姿随处可见。古夜郎人的住房、发型、服饰、婚俗、葬式、饮食、节日、风俗等等,在这些地区的民族风情中均不乏其踪影遗迹。古夜郎人开天辟地,改变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渴求与苦斗,他们自信自立的拼搏精神,他们希望走出封闭,渴望与先进文化交流的强烈意识,经受了历史的冲刷与选择,闪射在夜郎故土及其相关地域之上。

当然,夜郎文化从它产生到流变至今,都是一种弱势的边缘文化。但它不断地吸收着中原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时又总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正因为它的边缘性,故而在历史上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受到正史的冷漠,没有人留意去改变它或取代它。它才能像默默无闻的涓涓细流一样存活下来。当全球化浪潮对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产生巨大冲击的今天,人们才格外珍视处于相对封闭的人文生态环境之中,具有顽强生命力和独具特色的夜郎文化。这便是夜郎文化备受关注、并且可以加以利用的重要原因。

二

最早使夜郎国历史和夜郎文化的研究从学术殿堂走向现实,当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学者和旅游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他们在“'99夜郎学术研讨会”上,刮起了一股“夜郎在六枝”的新风。在六枝特区启动夜郎文化战略的同时,贵州各地与夜郎国和设置夜郎郡、县有关的地方,也开始寻求夜郎文化开发利用的突破口,贵阳、长顺、福泉、赫章、望谟、桐梓等地都先后打出具有自己历史底蕴、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夜郎”牌。在制定贵州旅游规划时,贵州专家组的许多人都主张贵州应用“夜郎”品牌,整合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夜郎文化”或“夜郎故地上的文化”这一概念取代普适性的“民族文化”这一概念。世居贵州的苗、布依、侗、彝、仡佬、土家、水、回等17个少数民族,在我国最大的喀斯特省、世界喀斯特分布最集中、发育最强烈的、最典型的黔中大地上,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适应性和创造力,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与喀斯特自然环境和谐共处或顽强抗争,从而形成了多元一体、封闭与开放、辉煌与衰落、先进与落后、抗拒与接纳、大同与小异种种矛盾统一的民族文化特色。对这种内涵丰富得难以穷究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

选择、优化和提升,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和回归两千多年前的夜郎故事,不是展现原来曾经有过而已经被历史淘汰和人们选择后加以摒弃的愚昧和落后,不是要引导当代人去适应古代人的审美情趣,拖着人们去复古倒退,而是寻找失落的文明品牌,使之再生,使原生态的美与现代美经过艺术加工、提炼而巧妙结合。夜郎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演进,与一切文化演进的轨迹一样,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纷乱到明晰,由简单到复杂,由散漫到系统,以臻于一致与和谐。把夜郎文化引入区域文化、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建设中,创造原始美与现代美、自然美与人工美的最佳结合,是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弱势区域独辟蹊径的必然选择。

开发利用夜郎文化的障碍,最主要的是观念陈旧、不能超越自我与前人。对于夜郎品牌和夜郎文化,不是外界不认可,而是夜郎文化的传人及其夜郎文化资源的拥有者,特别是我们有些地区的决策者自身的心理障碍。他们因为自身所处的地域长期发展滞后而感到焦虑甚至自卑、羞愧。在他们心目中,夜郎国之所以家喻户晓,夜郎文化的开发利用已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非完全出于夜郎国在古代曾经创造的辉煌,或夜郎文化的丰富蕴涵已为世所公认,很大程度上源于夜郎自大典故的广为传播。如果把夜郎自大典故仅仅认为是夜郎王继滇王之后,也向汉朝使者询问:“汉孰与我大”,便认为是用来讥笑贵州和夜郎故土的话,未免太过浅薄与狭隘。作为一个流传了两千年的汉语典故,它的典源虽与古代的夜郎故事有关,但它的文化内涵与警示价值已经成了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何况夜郎踵滇王之后也有“汉孰与我大”的提问,除了对自己在西南夷中强大的满足而自尊、自信、自大外,也有急于想了解外面世界的求知欲望。无论对夜郎王此种心态评价的好坏,丝毫不涉及对夜郎文化的褒贬。我们毋需为自己承袭了夜郎文化的基因而自卑,更不必抛弃或割断夜郎文化与我们生存地域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血脉联系。数典忘祖,此中国优秀文化传承之大忌。我们只要消除自身的不正常的心理障碍,夜郎文化的开发利用便大有作为。

当贵州全省都沉溺在自然拥有“夜郎”品牌并不珍惜的昏然之中,当我们还在为贵州是否打“夜郎”品牌或何处才可以打“夜郎”品牌而争论、犹豫时,从毗邻的湘西、滇东北、川南杀出一匹匹黑马——新晃、会泽、宜宾等地,把贵州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新晃拟申请改名夜郎县,把夜郎品牌打得声震四方。会泽县要兴建夜郎王城,将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以唐继尧为代表的近代

历史文化熔铸起来。四川宜宾拟以南方丝绸之路为纽带,将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滇文化联系起来。桂西也可以将与夜郎同一时代勾町王的及勾町史事牵联起来。今重庆地域秦汉时期与今贵州地域也有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贵州却步履犹豫。

湖南新晃有关领导坦然承认,贵州研究夜郎比新晃早几十年,而且成果十分丰富,他们是在贵州“'99夜郎学术研讨会”之后才受到启发,并着手思考开发利用夜郎文化品牌为新晃经济服务的。新晃聚全县之力,引国内外之智,着力挖掘、开发、打造、利用“夜郎”品牌。新晃县委、县政府的决策立即得到全县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新晃利用夜郎文化的举措和几年来所收到的实效,为开发利用夜郎文化提供了可行性的实证。贵州六盘水市先有六枝一鸣惊人,却后继乏力,成效甚微,但亡羊补牢,急起直追,也许将执开发利用夜郎文化之牛耳而后来居上。赫章县有可乐考古入选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荣誉,拟与新晃、六枝为“夜郎县”名一争高下,并通过人大地方立法的方式,确保开发利用夜郎文化成为全县谋求发展的永续性工程……夜郎文化的市场价值和品牌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地方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所认识。失落的夜郎文明品牌将再现辉煌,被抛弃或被尘封的夜郎文化将获得新生,并以此推动和反哺夜郎国历史的学术性研究。

三

在全球化进程加快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并将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中,原先的按行政区划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和开发产品的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国内外公平竞争的要求。代之而起的,将是按经济区域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共同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与此同时,按现行行政区划来确定区域文化和几千年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类别也是不科学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呼唤区域文化的出现。

夜郎文化原本就是古代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并不是以当今的行政区划所能框定的。过去囿于行政区划的局限,出现了贵州与周边省区相互争抢、相互否定夜郎品牌的情况,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自我否定。重新界定夜郎文化的空间范围及其区域价值,不仅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更有利于夜郎文化的开发利用。

2004年6月1日至3日,在粤、港、澳举行的“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理”以及“9+2”省区政府领导人共同界定的《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9+2”的珠三角区域合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珠三角区域将在十个重大领域加强合作。在这一区域合作的大背景下,开展夜郎文化经济圈的合作,符合这一历史趋势,并且是可以纳入珠三角的旅游合作与文化合作中来加以发挥。以贵州为中心的夜郎文化经济圈,可以全力推进以夜郎为品牌和特色的旅游合作,共同研究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共同策划和推广夜郎精品旅游线路,树立夜郎文化区域的旅游新形象,打造夜郎区域的旅游品牌。同时,也可以共同研究和开发夜郎文化产品,培育以夜郎文化为资源和品牌的文化产业。为“9+2”的合作框架增添新的内容与亮点,以小区域的有效合作,推动整个珠三角的区域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求经济资源的整合,而且要求地区间有影响的文化资源实行跨行政区划乃至全国性的重组与整合,以形成垄断性的优势。因此,谁掌握了文化资源重组、整合的契机,谁居于文化资源重组、整合的主导地位,谁就将拥有独具的文化产业优势,并凭借它获得相应的经济优势。

资源重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发展旅游业、突出文化产业特色以及创造具有全国一流水准和国际化影响的文化产品、旅游产品的必由之路,也是西部一些省区建立旅游支柱产业的成功经验。深圳的“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北京的“世界公园”,海南的“南山生态旅游示范区”,昆明的“世博园”、“民族文化村”等等,都是文化资源重组所形成的旅游业的龙头性产业。贵州及其相邻近的滇东北、川南、湘西、桂西与夜郎文化有历史渊源的地区,在发展旅游业和发展文化产业时,确实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遗憾的是此前是各自为政,而且有时还相互贬损,较少意识到联合起来,共享夜郎文化资源,是实现共赢的必由之路。

夜郎文化本身是跨地域的经历了长期历史演变后形成的地域文化,在各历史时期、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间有不同的表现,这给我们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开发利用夜郎文化资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避免产品的趋同。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记载有楚顷襄王时,遣将军庄蹻溯沅水略巴、黔中以西地。“庄蹻溯沅水,灭且兰,夜郎侯迎降,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就将令湘、黔、滇联系在一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五尺道,又使四川与

滇、黔相通。至西汉时,唐蒙、司马相如开夜郎道,自犍道指牂牁江,更使巴蜀与夜郎和滇相通。而汉武帝平南越时,将今川、滇、黔、桂等有关地区纳入了他的战略计划中。而夜郎灭国以后,从汉至唐、宋各朝所设置的夜郎郡县,从今贵州境内一直向东延伸至今湘西新晃、麻阳一带。近年来在贵州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青山铜鼓山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文物,以及在今黔西北、黔西南一带发现和出土的夜郎时期的文物,既证明夜郎青铜文化与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越文化和滇文化之间的联系,又具有自身的特色。一项铅同位素的测试报告表明,古夜郎铸造青铜器的矿料,采自滇黔交界处。而古代属于滇国的今云南东川制造的铜釜,交流到了今贵州赫章、兴义、兴仁等地。至于存活于各地民间的民俗事象和民间文学中的夜郎文化,更说明今贵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中,都贯串着夜郎文化这条无形的文化链,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互补共生。在上述的五省一市的民族民间文学中都有夜郎史影存在。它们表现在共同的竹文化、铜鼓文化、物质文化、习俗文化、精神文化之中。在这些地区的夜郎文化精神中,都有共同的自然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而这些散落于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宝贵文化资源,需要我们去发掘、整合、提升,使之成为促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动力。

近些年来,贵州及其周边省区的不少地方,虽然都意识到夜郎品牌、夜郎文化的价值,对之做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利用。特别是贵州的六盘水市、贵阳市、毕节地区、湖南的新晃和云南的会泽及滇东北等;有的把开发利用夜郎文化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对待;有的当作一项旅游产品来打造;有的更当作振兴县域经济的战略来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但是,迄今为止,那种开发利用仍处于分散型的启动,未能在统一的目标下,在系统而可操作的科学依据支撑下,实现资源整合。为了整合现有的研究力量和周边省区的资源,形成跨省区的以夜郎文化为核心的区域文化、区域经济研究的实体,经过与省内外专家学者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协商,在2004年4月中国史学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黔、滇、川、渝、湘、桂六省区市史学会负责人形成共识,在贵州民族学院的鼎力支持下,同年7月,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它为各地研究和开发利用夜郎文化搭建一个平台,建立协调协作的机构和机制。以学术研究为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变相互争抢和能量内耗为资源共享,相互促进,共创品牌,互补多赢。这是研究和开发利用夜郎文化资源的必由之路。

贵州人民出版社选编并出版这本论文集,意在向广大读者展示夜郎研究不平坦的学术之路,勾勒夜郎历史的研究如何向夜郎文化延伸,反映“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学术的通俗化。当然,也会给开发利用夜郎文化的地方或人们提供一些理性的科学支撑,避免因名利驱使而出现的荒诞与庸俗。推动文化资源共享,促成夜郎品牌升值,使夜郎文化这一失落的文明变为寻找回来后又再度创新的文明。也许,这本文集还将引领初涉夜郎问题研究的人们体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种治学的境界。

“夜郎见证”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王良范
副 主 编：罗宏炜 霍冠伦
编 委：王良范 罗宏炜
 罗晓明 刘亚卓

目 录

贵州研究夜郎五十年述评	熊宗仁(1)
夜郎史迹初探	徐中舒 唐嘉弘(14)
略论古牂牁、夜郎的政治	周春元(29)
汉牂牁郡地理考释	方国瑜(41)
夜郎方位考略	侯绍庄(62)
古夜郎历史的考古学观察	孙 华(76)
古夜郎地区铁器化进程的考古学考察	白云翔(82)
贵州夜郎考古观察	梁太鹤(92)
汉初夜郎社会性质浅析	余宏模(107)
古夜郎与秦汉对西南的开发	熊宗仁(113)
论夜郎国的族属问题	田曙岚(121)
夜郎是“百越”族属	江应梁 史继忠(129)
简论古夜郎居民的族属问题	张正东 翁家烈(140)
夜郎族属诸说之我见	李 卿(148)
论古夜郎是以彝族为主体建立的方国	王继超(157)
夜郎是布依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周国茂(168)

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	李衍垣(174)
贵州夜郎时期青铜兵器综述	李 飞(183)
独领风骚的夜郎考古宝地——赫章可乐	唐文元(200)
黔西南州发现的夜郎青铜器	黄理中(209)
交乐汉墓出土文物与夜郎的关系	李奇华(212)
望谟出土的夜郎青铜器	张 元(216)
从考古材料看古夜郎与滇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	李保伦(228)
古夜郎国铜釜的铅同位素考证	万辅彬 郭立新 李晓岑 张玉忠(231)
夜郎考古最新进展	
——2004 年威宁中水考古发现综论	张合荣(238)
试论夜郎与汉文化的关系	宋世坤(248)
从彝文文献记载探索古夜郎	王正贤(256)
《夜郎史籍译稿》简述	龙正清(269)
不同视野下的夜郎	
——兼论赫章与夜郎的关系	熊宗仁(280)
历史人类学与夜郎文化之谜	王鸿儒(294)
夜郎文化门外谈	王鸿儒(314)
夜郎文化资源开发的实践与思考	王行水(322)
关于建立泛珠三角夜郎文化旅游圈的构想	熊宗仁(327)
发现东方与重释夜郎文化	王岳川(337)
后 记	熊宗仁(344)

贵州研究夜郎五十年述评

熊宗仁

夜郎,战国秦汉时期一个确实的历史存在虽然早已消亡,但却成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孜孜以求解答的历史之谜。

贵州解放初期,由于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是形势的当务之急,史学研究的重点在普及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贵州学者乃至学界名流如郭沫若对夜郎的认识,多依据前人研究的成果而莫衷一是,错讹纷呈。1958年,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搜集、整理了一批贵州史的资料,贵州古代史的研究与编写工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夜郎作为贵州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研究自然纳入了计划。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贵州古代史的研究始终没有真正系统开展,夜郎研究也只在少数学者中浅尝辄止。直至“文化大革命”一切学术研究均成了“革命”的对象,夜郎研究始终未有成果问世。

1970年7月,由于考古中发现了夜郎时期的重要文物,贵州省博物馆约请省内各高校、原科研部门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安顺举办考古训练班。侯哲安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他多年收集整理夜郎文献的情况。虽然会上有所讨论,但没有形成论文交流,会后也未留下有价值的系统记录。然而,这确是贵州研究夜郎的开创性的破题之举。

粉碎“四人帮”以后,万象复苏。1976年的《贵阳师院学报》第3期发表

了宋世坤的《试论西汉时期夜郎的社会变革》，论述了夜郎的社会性质，汉武帝通好西南夷，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导致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1977年的《贵阳师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杨庭硕、谭佛佑的《简话夜郎》，进一步论述了夜郎的社会性质。同年9月1日，《光明日报》对上述两文观点作了述评。这年第4期的《贵阳师院学报》还发表了王燕玉的《夜郎沿革考》，论述了夜郎国的概况、疆域、汉夜郎的兴衰以及夜郎国灭亡后历代在夜郎故地或有其影响的地区设置夜郎郡、县的历史源流。

1978年3月，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决定恢复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稍后，又在此基础上筹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8月，刚刚恢复研究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在贵阳召开古夜郎问题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20余篇。与会者从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角度，根据文献记载，对夜郎的疆域、族属和社会性质等问题作了讨论。一些与会者认为夜郎的社会性质处在部落联盟的原始社会末期，但大多数与会者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夜郎还不是成熟的奴隶制国家，但确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但是，对夜郎的疆域，特别是夜郎的政治中心、夜郎的族属等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会后，选择会议论文14篇编辑为《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1979年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贵州史学界对夜郎研究的第一次展示。它引起了省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形成贵州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成为贵州社会科学界开始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

1979年8月，刚组建不久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和贵州省图书馆等单位的支持下，与贵州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夜郎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作者中有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的专家。会上进一步就夜郎的族属、地望、社会性质等问题从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关问题的研究虽较上一次讨论会深入，但分歧也更大。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1月出版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共收入论文23篇。

两次夜郎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两本论文集的出版，引起了省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此期间，一系列研究夜郎的成果相继发表，共同形成了夜郎研究热。1979年，《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发表了宋世坤的《贵州赫章可乐“西南